

# “大思政课”的内涵辨析、建构原则与善用之道

刘 富 胜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大思政课”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灵活性等显著特征。有别于学校思政课的专业性、系统性、规范性,“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既不能因学校思政课的不可替代而忽视“大思政课”的作用,也不能因“大思政课”的实践性强、影响力大而弱化学校思政课的地位。“大思政课”和学校思政课都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种形态,不能把“大思政课”简单混同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是善用“大思政课”的前提,要将潜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成就资源、英雄模范资源转化为显性的思政育人资源。建设“大思政课”需要坚持导向鲜明原则,突出政治属性,优先解决“建什么”;坚持以生为本原则,突出育人本性,重点解决“为谁建”;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突出差异特性,着力解决“如何建”。善用“大思政课”,积极推动“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深度对话、有效融合:一是借鉴“大思政课”理念,优化学校思政课教学模式,深入推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形式、教学话语的创新;二是借力“大思政课”师资,突破学校思政课教学瓶颈,把思政课讲准、讲深、讲透、讲活;三是借用“大思政课”资源,拓展学校思政课教学空间,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四是发挥“大思政课”优势,塑造学校思政课教学品牌,扩大思政课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关键词:**“大思政课”;因地制宜;内涵式发展;深度对话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2-0027-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203

## 一、引言与学术研究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sup>[1]</sup>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和关键课程,上好思政课需要有“大思政课”的思维,不能把思政课局限于教材、课堂和校园。

围绕“何为‘大思政课’”和“如何‘善用大思政课’”,国内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大思政课”的学理阐释。冯秀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大思政课”建设的灵魂,既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也要反对实际脱离理论,要警惕“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唯实践主义倾向”<sup>[2]</sup>;仝联勃、孙玥认为,“大思政课”遵循了“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逻辑,“摆事实、讲道理”是其鲜明特征<sup>[3]</sup>;张强军认为,“大思政课”回应了现实挑战,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最新动力<sup>[4]</sup>。二是“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王雪、刘世华认为,“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大课堂、大师资和大平台<sup>[5]</sup>;马福运、宋晓珂认

**收稿日期:**2025-11-08

**作者简介:**刘富胜,男,哲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唯物辩证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两个结合’视域下研究生思政课深度对话教学方法创新研究”(24VSZ134)。

为,“大思政课”之所以“大”,就在于突出了人才培养的大担当、强化了多元协同的大格局<sup>[6]</sup>;肖珍、靳玉军认为,“大思政课”之大,在于整合了丰富多样的大资源、打造了专兼结合的大师资<sup>[7]</sup>;吴潜涛、杜思睿认为,“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大的责任担当、大的内容格局、大的课程体系、大的延伸空间<sup>[8]</sup>;石书丞认为,“大思政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课”,具有思政课的属性、意义和要求,是“思政课的新形态”<sup>[9]</sup>;向云发、杜仕菊认为,“大思政课”是引导学生做奋斗者的实践大课和启迪学生担当作为意识的人生大课<sup>[10]</sup>。三是“大思政课”的资源赋能。彭庆红认为,要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打造“大思政课”的数字教育新样态<sup>[11]</sup>;李大健认为,要通过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联动、多资源共享赋能“大思政课”,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浸润力、实践的涵育力、成果的共享力<sup>[12]</sup>;宫长瑞、张乃亮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新引擎和新工具,能够切实提升“大思政课”的育人厚度、精度和进度<sup>[13]</sup>;邱艳认为,红色研学集研究性、探究性与体验性于一体,是“大思政课”逐步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途径<sup>[14]</sup>。四是“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谭志敏、张齐学认为,“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一种人员广泛参与、内容开放、时空充分利用、虚实载体互补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sup>[15]</sup>;聂迎娉、傅安洲认为,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运行,需要锻造一支“认识同频、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高素质队伍<sup>[16]</sup>;吕超认为,建设“大思政课”要在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协同效应,形成“齐力共为”的崭新格局<sup>[17]</sup>。

综上,“大思政课”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拓展空间:一是“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阐明两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二是“大思政课”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两者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差异;三是建设“大思政课”与善用“大思政课”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论证思政课教师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sup>[18]</sup><sup>34</sup>善用“大思政课”的问题,是“何为大思政课”“如何建构大思政课”“如何更好发挥大思政课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统一,由此构成本文的研究逻辑。

## 二、“大思政课”的内涵辨析

与“大思政课”相对的是学校思政课,前者是社会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也被称为“思政小课堂”。“大思政课”之“大”,从目标来讲,就是要服务“国之大者”;从内容来讲,就是用好一切具有育人属性的“大资源”;从主体来讲,就是要造就一批善讲思政课的“大先生”;从对象来讲,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社会大众”。“思政小课堂”之“小”,是指空间局限于课堂、校园,受众局限于学生。当然,“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妙用。促进“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有效融合,需要全面把握“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异同。

### (一)“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之“异”

“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之“异”,既有教学主体、教学场域、教学资源的不同,也有教学规范与教学目标的不同。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与校内的其他课程一样具有理论研究的专业性、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教学运行的规范性。以高校为例,思政课“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课程,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其他各类高校的最根本的特征”<sup>[19]</sup>。学校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要让学生懂得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则和基本道理,而且要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中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意志;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信念。与学校思政课相对应的是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sup>[20]</sup>,学校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一样具有科学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上好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

高。”<sup>[21]</sup>上好思政课,不仅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而且还要让懂理论、有方法的老师讲准、讲深、讲透和讲好道理。学校思政课程“是一个具有统一性、层次性与互动性的整体系统”<sup>[22]</sup>,需要及时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需要与现实相结合;但作为整体系统,学校思政课程有着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不能随意进行增减,而是要着力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政课程群建设。

“大思政课”是运用校外资源开设的思政课,是学校思政课的“延展形态”<sup>[23]</sup>。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4]501</sup> 学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互影响;影响学生思想和价值理念的不仅有教师,也有社会其他群体。“大思政课”不仅没有限定的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固化的内容和形式。如果说学校思政课是要以系统知识为载体,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那么“大思政课”则是以主观体验为中介,强化对特定观念的情感确认。

## (二)“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之“同”

“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之同,既体现在目标上,即都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体现在形态上,即都包含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根本,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补充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sup>[21]</sup>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教社科[2021]2号),对高校思政课的课程设置和学分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把思政课实践教学纳入教学计划(专科为1个学分、本科为2个学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理论教学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知识体系,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之间,不存在任何真空的地带,“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sup>[25]327</sup>。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最多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工人阶级要形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灌输并不等同于生硬强塞,而是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在于形成“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体系”<sup>[26]</sup>。人们对任何理论的接受和认同,都是实践与认识、感性与理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理论教学作为基础,实践教学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离开了实践教学,理论教学的成效就要大打折扣。学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具有鲜明政治导向和理论导向的教学活动。与其他课程的专业实践不同,思政课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与其他部门开展的社会实践不同,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一门课程,有着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规范的教学流程,旨在强化理论教学的重点、突破理论教学的难点以及指导学生运用理论教学中获得的知识去辨析社会关注的热点。

“大思政课”同样具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种形态。“大思政课”不仅有“走出去”的实践教学,也有“请进来”的理论教学。“大思政课”有很多种形式:“行走的思政课”“场馆的思政课”以实践教学为主,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英雄模范的思政课”“行业精英的思政课”则是以理论教学为主,邀请主讲者走进校园,“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去感染学生,引领学生”<sup>[27]</sup>。

## (三)“大思政课”能够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特殊作用

“大思政课”没有固定的教学时空,也不限于特定的教学主体和教学内容。教育和学习从来就不局限于校园,父母是个体最早的老师,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家庭生活就是一门重要的思政课,父母的言行随时随地都在影响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优良家风的熏陶和传承,会使家庭成员养成向上向善的美德”<sup>[28]</sup>。“大思政课”不仅包含家庭教育,而且也蕴含着自然环境、社会交往、历史文化、网络平台中的思政元素及其教育过程。

“大思政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大思政课”没有固定的教师队伍,人们能够相互成为学习的榜样,充分彰显“以身载道”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时代楷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学雷锋典型,都有机会成为“大思

政课”的优秀师资。二是教育资源的广泛性。“大思政课”没有固定教学内容,校园文化、历史遗迹、民间故事等都可以成为“大思政课”的教学资源。三是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大思政课”没有固定的教学方法,既可以有规划地集中参访,也可以点对点地随机教导。“大思政课”整体上拓展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视野。就理论教学而言,“大思政课”能够为理论阐释提供鲜活素材;就实践教学而言,“大思政课”能够为学生走进历史、接触社会提供实践场域。

### 三、“大思政课”的建构原则

“大思政课”的根基在“课”<sup>[29]</sup>。作为课程,就要从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出发,开展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是善用“大思政课”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历史文物、革命遗址,还是建设成就、先进典型,都仅仅是有待唤醒、有待挖掘、有待建构的潜在资源,而非已然成熟、可以“拿来就用”的成熟课程。“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种类型,既有上级部门主导的共建,如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等十部门2022年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各地出台相应的落地举措;也有以场馆为主的研发,如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面向大中小学开设的“大思政课”;还有以学校为主的建设,如高校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建设的“大思政课”。无论哪种类型的“大思政课”,都必须坚持导向鲜明、以生为本、因地制宜等原则。

#### (一)坚持导向鲜明原则,突出政治属性,优先解决“建什么”

“大思政课”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范畴”<sup>[30]</sup>,是不同于学校思政课的思政课。“传统”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中也蕴含“糟粕”,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和现代阐释”<sup>[31]</sup>;“网红”也不等同于“正能量”,在建设“大思政课”的过程中,必须对资源进行甄别与筛选。

“大思政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充分发挥新时代伟大成就的教育激励作用,这就要求“大思政课”要重点围绕“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进行设计,以典型经验、典型案例和典型人物为载体,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例如,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但多数同学对这些大事缺乏直观的感受,可以邀请脱贫攻坚中的典型人物走进校园讲授“大思政课”。这样的“大思政课”依然需要打磨,讲好这样的课依然“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sup>[21]</sup>,既要让课堂因讲述者的亲身经历而具有“实干味”“代入感”,也要让课堂因讲述者的精心准备而具有“理论味”“获得感”。“大思政课”要以“两个结合”为引领,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甄别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与“糟粕”、“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成分,不能把传统等同于优秀、把历史等同于革命、把建设等同于先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历史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阐释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大思政课”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形成“四个正确认识”,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这就要求“大思政课”运用情境式、体验式、沉浸式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坚持以生为本原则,突出育人本性,重点解决“为谁建”

“大思政课”有着多种面向,既可面向党政干部,也可面向社会大众;既可面向教师,也可面向学生。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大思政课”,是指面向学生群体的“大思政课”。即便基础资源相同,也并不意味着“大思政课”必然相同;教学对象不同,对教学资源的取舍、重点内容的强调、方式方法的运用都会不同。

“大思政课”要服务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学段,应建设不同种类的“大思政课”。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要以视觉冲击和故事情节来影响学生价值判断;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

的思想基础,要以实物呈现和场景再现来印证教材知识;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要以奋斗足迹与伟大成就来增强政治认同;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引领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思政课”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大思政课”不是僵化固定的模式,而是动态生成的过程,学生不是“大思政课”的被动旁观者和被动接收者,而是“大思政课”的主动参与者和建构力量。教师、学生、场域共同构成了“大思政课”,教师是“大思政课”的主导,把握课程教学的目标和方向;学生是“大思政课”的主体,不仅在教师的主导下“看”和“听”,而且也要在课堂中主动“思”和“说”,更要在与历史文物、现实人物的交互对话中生成思想、升华情感。“大思政课”要促进学生的内化生成,应当综合运用知识讲授法、场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形成相对完备的教学闭环。教学前,要有学情分析,根据学生年龄、专业、成长环境等特点进行备课;教学中,要回应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教学结束后,要对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帮助学生强化对“大思政课”的整体认知。

### (三)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突出差异特性,着力解决“如何建”

“大思政课”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所谓统一性是指“大思政课”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都能够发挥思政育人功能;所谓差异性是指各地的“大思政课”不同、各校的“大思政课”不同、各专业的“大思政课”也不相同。

没有千篇一律的“大思政课”。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例,各种精神都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涌现出的、值得人们永远铭记和赓续的精神力量,都能成为“大思政课”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有些精神与特定事件相关,比如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有些精神与特定人物和特定群体相关,比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以及女排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有些精神与特定地方相关,比如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建设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大思政课”,并不要求各地把所有的精神都纳入同一种模式的“大思政课”,而是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大思政课”建设,实现课程建设的“可及性、可操作性和可转化性”<sup>[32]</sup>,实现课程互补,避免重复建设。面向学生的“大思政课”,也并不意味着每个学校都要建设“大思政课”场馆。这样做既浪费资源,也不一定能建好。因地制宜、突出差异,意味着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学校参与的共建共享原则。“大思政课”建设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33]147</sup>,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sup>[33]147</sup>。“大思政课”建设需要资源、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需要社会群体和企业的广泛参与。以文物收藏为例,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大思政课”的重要资源。文物收藏既可以是政府行为,也可以是民间行为。在民间收藏中,有基于个体兴趣偏好的收藏,也有基于市场化运作的收藏。能够讲述文物背后文化故事的个体,能够为公众提供文物参访的企业,都是“大思政课”的参与者和协同力量。学校是建设“大思政课”的重要力量。学校既有建设“大思政课”的直接需求,需要以“大思政课”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新时代学校思政课的“质量和水平”<sup>[34]</sup>,也有建设“大思政课”的师资优势。“思政课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核心主导者,故而他们也应当是‘大思政课’主导者中的核心力量”<sup>[35]</sup>。

## 四、“大思政课”的善用之道

善用“大思政课”,就要推动“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深度对话、有效融合,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 (一) 借鉴“大思政课”理念,优化学校思政课教学模式

灌输和对话是学校思政课教学的常用模式。灌输是学校思政课的显著优势,但正确的灌输还需要

“尊重学生的特点与需求”<sup>[36]</sup>;对话是学校思政课的重要方法,但有效的对话是深层的互动生成,而非浅层的一问一答,需要以“层层深入的现实追问促成具体可感的价值体认”<sup>[37]</sup>。“大思政课”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有效对话提供了场域。

“大思政课”没有固定的载体和形式,一切以教育对象为中心,创造出教育对象能够接受的语言、场域和环境,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充分借鉴“大思政课”的这一理念,深入推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形式、教学话语的创新,积极打造“对话的思政课”,实现真诚交流与价值引导。从教学内容来讲,一方面,要推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化。任何教材都会自成体系,但并非教材体系中的所有内容都需要讲授,需要留出部分内容供学生自学,更好地实现教学相长;教学体系既要有清晰的逻辑链和问题链,也要突出教学重点与难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不仅讲知识,还要讲方法,更要讲为人学的大道理,帮助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另一方面,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各个学段都要把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做好各学段教学内容之间的有机衔接,既要避免简单重复,也要避免遗漏重点。从教学环节来讲,需要打破对课件的路径依赖,走出“只教书不育人”的思维误区。在备课阶段,既要深耕教材、做好教学方案,也要熟悉学生,依据学情完善教学设计。在授课阶段,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积极管理课堂,让学生能来能听,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愿学乐学。在课后阶段,既要教学进行及时总结,反思教学难点、打通教学堵点、提炼经典案例,也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反馈,及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热情地为学生解疑释惑。从教学形式来讲,既要有理论教学,也要有实践教学,“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sup>[38]</sup><sup>203</sup>,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育锻炼、劳动教育和审美鉴赏等实践活动。从教学话语来讲,要推动政治语言、学术语言向生活语言的转化,既注重教学语言的规范性,也强调教学语言的吸引力。

## (二)借力“大思政课”师资,突破学校思政课教学瓶颈

学校思政课既存在教学时长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冲突,也存在各门课程之间相互衔接的问题,还存在教师专长与教学专题之间的矛盾。“大思政课”并不追求教学的整体性,而是强调教学的专题化,为学校思政课准备了大量优秀师资。“大思政课”要“吸纳社会道德模范、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等从事一定的教育教学工作”<sup>[39]</sup>。

“大思政课”没有固定的师资,采用的是“谁专业谁来讲、谁在场谁来讲”的原则。学校思政课则不同,要么采用团队授课,即由多位教师组建师资团队,共同完成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要么采用个人授课,即由个人完成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无论是个人授课,还是团队授课,都会遇到“专题不专”“案例不深”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由于思政课的综合性,任何一门思政课都会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个人或团队难以做到全面深入。例如,《思想道德与法治》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更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部分学科和部分领域无疑会成为思政课教师的相对“知识盲区”。这并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师不能讲授处于相对“知识盲区”的内容,而是说思政课教师不容易把这些内容讲深、讲透、讲活。另一方面,是由于思政课的实践性,几乎所有思政课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思政课教师或团队难以实现二者兼顾。多数思政课教师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其他工作经历,很难具体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呈现给学生。借力“大思政课”师资,就是要让各行各业的优秀群体走进校园,打造“有感染力的思政课”,让学生能够从专业讲解和鲜活实践中得到滋养。“借力”意味着思政课教师依然是上好思政课的关键,其他群体则是参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意味着,上思政课需要借专业课教师之力,组建包括专业教师在内的思政课教学团队,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发展;需要借专业场馆讲解员之力,以文物和故事使思政课“活起来”“燃起来”;需要借优秀党员和“时代楷模”之力,使学生近距离感受实践的伟力和崇高的品格。

### (三) 借用“大思政课”资源,拓展学校思政课教学空间

校园内的思政教育处于抽离于社会关系与现实的“脱域化”状态<sup>[40]</sup>，“大思政课”实现了空间转换，让思政教育更加立体化。

学校思政课教学包含知识性维度和价值性维度。知识性维度是指思政课是特定的知识体系，是值得学习的课程；价值性维度是指思政课是以知识体系为载体，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讲好思政课，既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还是理想信念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多种资源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教师、教材、教室所组成的校园教学空间是有限的，但有限并不意味着无效，校园教学空间甚至在信息封闭、知识匮乏的时代也能使教育更加有效；相反，在信息开放、知识更新加速的时代，教育的有效性却可能大打折扣。随着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学生能够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找到自己想要获得的知识，但学生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教师的指导来获取正确的知识。“大思政课”突破了学校思政课的这种局限性，既有充足的线下资源，也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大思政课”资源之所以能够被借用，就在于这些资源所具有的思政属性和公共属性，使之能够在思政教育中发挥作用，能够为多所学校思政课教学共享。学校思政课教学之所以要借用“大思政课”资源，既在于学校思政课教学资源的有限性，也在于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借用”的本质是有机融入，即将“大思政课”资源精准融入学校思政课教学，增强学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理论教学中，需要借用“大思政课”的文献资源和视频资源，以此来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和视觉空间；在实践教学中，需要借用“大思政课”的特定场域和特定人物，以此来拓展学生的体验空间和交往空间。积极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使师生在行走中实现具身教育，共同感受行走带来的身体变化和思想变化，师生之间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建立信任关系，进而为思政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 (四) 借助“大思政课”特色资源,塑造学校思政课教学品牌

“大思政课”为学校思政课品牌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一方面，红色场馆、革命教育基地都拥有独特的思政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与学校联合开展思政教育也是这些场馆和基地建设的内在要求。

学校思政课的作用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在于知识讲授，而在于场域的特殊性和师生的共在性。从知识讲授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供完整的知识图谱，而且能够提供受教育者喜欢的声音和人像，从而实现知识教育的目标。场域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无论人工智能所营造的氛围多么逼真，都无法替代线下场馆的体验，更无法替代行动参与带来的思想和情感变化。师生的共在性不可替代，课堂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学生，这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替代的。场域的特殊性和师生的共在性共同塑造着学校思政课品牌，学生不同、学校不同、地域不同，思政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重点也应该有所区别。与学校思政课的普遍性相比，“大思政课”具有天然的特殊性。不同地方的“大思政课”不同，“井冈山精神”塑造了江西的“大思政课”，“红岩精神”塑造了重庆的“大思政课”，“延安精神”则塑造了陕西的“大思政课”。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省份和地区不能讲授这些内容，而是指事件发生地开设相应的“大思政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借助“大思政课”特色资源，积极打造“有辨识度的思政课”。在理论教学中，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辅助教材、建设案例库，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校本思政选修课；在实践教学中，结合所在区域的特色文化资源，开展文献挖掘、故事整理、艺术创作、展示宣讲等活动。我们应持之以恒地开展从学校、学科和学生出发的学校思政课特色教学活动，塑造教学品牌，并“通过品牌效应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sup>[41]</sup>。

## 五、结语

善用“大思政课”，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与现实结合，就要用好文化资源；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就要用好历史资源；增强使命担当，就要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坚定理想



信念。善用“大思政课”,就要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既强调学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的关键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强调“大思政课”是学校思政课的有益延展,是大思政格局的重  
要组成部分;善用“大思政课”,就要深刻把握其内涵,“大思政课”不是学校思政课的简单扩大版,不能  
把“大思政课”混同于学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坚持导向鲜明、以生为本、因地制  
宜等原则,建设与学校思政课相协同的“大思政课”。学校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象牙塔,教育本来就是  
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空谈教育。“大思政课”源于历史、源于生活,只有建设好和运用  
好“大思政课”,才能全面提升学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质量。

## [参 考 文 献]

- [1]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组团”·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 [2] 冯秀军.“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23(8):84-89.
- [3] 仝联勃,孙玥.“大思政课”的唯物史观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8):104-109.
- [4] 张强军.“大思政课”的出场逻辑、比较优势和实践要求[J].大学教育科学,2023(2):33-40.
- [5] 王雪,刘世华.善用“大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的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6):62-65.
- [6] 马福运,宋晓珂.“大思政课”科学内涵的多维解读[J].中国高等教育,2022(19):29-31.
- [7] 肖珍,靳玉军.新时代“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与价值意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9):61-64.
- [8] 吴潜涛,杜思睿.“大思政课”的科学内涵、建设成就与创新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7):113-125.
- [9] 石书丞.深刻把握“大思政课”的本质要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7):104-112.
- [10] 向云发,杜仕菊.善用“大思政课”的基本问题论要[J].思想理论教育,2022(3):71-76.
- [11] 彭庆红.数字化推动“大思政课”建设依据、原则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1):96-104.
- [12] 李大健.以增强“三力”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8):48-56.
- [13] 官长瑞,张乃亮.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育人图景和实践策略[J].中国大学教学,2022(8):15-20.
- [14] 邱艳.红色研学赋能“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理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4):69-71.
- [15] 谭志敏,张齐学.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系统审视[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57-165,208.
- [16] 聂迎娉,傅安洲.“大思政课”运行的现实样态、价值旨归与路径优化[J].大学教育科学,2024(3):55-62.
- [17] 吕超.以“大思政课”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J].红旗文稿,2025(11):41-44.
- [18] 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
- [19] 余双好.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2):16-19.
- [20] 黄蓉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5(2):48-53.
- [21]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 [22] 贾晓旭.整体性视域下高校思政课知识体系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4):33-36.
- [23] 叶方兴.“大思政课”建设中的社会参与:依据、意蕴与原则[J].思想理论教育,2024(2):75-80.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5]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6] 刘书林.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坚守“灌输论”的缘由[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38-44.
- [27] 牛小侠.论高校善用“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本质和教学实施[J].思想战线,2025(4):157-163.
- [28] 吴默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立德树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1):66-70.
- [29] 任鹏,题旭丽.“大思政课”建设的当前态势、现实挑战和路径优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3):62-66.
- [30] 邓卫.深化“大思政课”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24(6):19-23.
- [31] 曾维伦,伍燕玲.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功能与意义——以“两个结合”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1-9.
- [32] 于红艳,唐晓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2):10-13.
- [3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4] 徐蓉,张飞. 试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三重境界[J]. 思想教育研究,2022(12):95-101.
- [35] 韩可. 课程论视角下“大思政课”的实施维度与实践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2022(5):72-77.
- [36] 曹金龙.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灌输”范畴再探[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1):38-45.
- [37] 高静毅. 高校思政课课堂有效提问的几点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J]. 2025(5):110-115.
- [3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9] 蒋笃运,詹璐遥. 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系统观[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23(1):131-137.
- [40] 王强,李青屏,王舒悦. 论“大思政课”的空间向度[J]. 教育研究,2025(5):122-133.
- [41] 陈红,宋成坤.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品牌化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11):136-138.

##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Utilization Approaches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Liu Fushe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s notably characterized by its diversity, decentralization, and flexibility, which set it apart from the professionalism, systematic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two are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We should neither overlook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because of its irreplaceability in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r weaken the latter on account of the former’s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Both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and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encompass two forms: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he former should not be simply equated with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serv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its effective utilization, which requires converting poten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resources of heroes and role models into ex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s adherence to three principle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lear orientation to highlight its political attribute and priorit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build”; upholding the student-centred principle to stress its educational essence and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for whom to build”;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emphasize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build”. To effectively utilise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in-depth dialogue and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it and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Firstly, we should draw on its concept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models of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advancing innovations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procedures, teaching forms, and teaching discourse. Secondly, by leveraging its teaching staff, we can overcome the teaching challenges in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delivering them accurately, in depth, thoroughly, and vividly. Thirdly, we should utilize its resources to expand the teaching dimension of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gain from these courses. Fourthly, by capitalizing on its unique features, we can shape distinctive teaching brands for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Keywords:**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depth dialogue

[责任编辑:赖黎捷]